

# 抗議

## 期二十二第

所望於產業界諸君（特載）  
汪精衛

中日和平的基礎（特載）  
褚民誼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特稿）  
馬遜

蘆變以來日本在華經濟行動一般  
從經濟地理檢討中日經濟合作之方式  
程巨卿

答中國諸君（上）  
西苓譯

日本不能征服中國論（上）  
劉鑑譯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選載）  
毛一波

英美企圖封鎖日本的一幕  
木軍譯

與中美日報略談和平  
余文周

予欲無言集  
葉紀懷

版出日一月一十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 特載 所望於產業界諸君 汪精衛

產業界諸君！這產業界三字包括凡是致力於經濟建設的人，無論投資本的，用技術的，出勞力的都在內。

自從戰事開始以來，數十年來日積月累的經濟建設都成灰燼；諸君為經濟建設所綴出來的一點一滴的血，一點一滴的汗，都成泡影。這不止是諸君的損失，是中國整個國家民族的損失。

如今的和平運動最大目的最大作用是怎樣復興產業，致中國於安定與繁榮；是怎樣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來謀中國的經濟提攜。

我過去承乏行政，正值國難日深，軍事方殷，生平懷抱的民主主義沒有半毫實現，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更是徒繆夢想，這是我所十分疚心的。但至今日，我還能和諸君說幾句話，就是因為我在過去幾年對於經濟建設沒有積下什麼罪惡，多多少少也會出過些心血和熱汗；所以我覺得有和諸君談幾句的必要，我就直說出來。

我今天說的話，還未能將復興產業的具體計劃以及中日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所定出來的經濟提攜的具體條件，一一列舉出來；我只能表示我的決心和我所認為必要的前提。我在今年九月七日起，分幾次接見中外新聞記者，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問我道：「你對於和平運動的決心在何

## 特載 中日和平的基礎 褚民誼

中日戰爭之必須結束，在現今兩國人民之間，是已充滿着此種信念。

東亞和平之必須奠定，在現今兩國的政治家間，是已認識其重要性。

我們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束，並不因為日本軍事上已經勝利而望和，使之適應此次歐戰中的國際形勢；也並不因為中國戰敗而求和，使之暫表屈服而準備再度的報復。如果是那樣的話，不但我們決不會主張和平，或許日本也不需要和平。因為若以前者的說法，日本未曾以二年多戰爭的經驗而認識滅亡中國的不可能性；若後者的說法，則沒有正確估計中國民族的創造性，和中國數千年歷史維繫的要素。所以中日和平的真實目的，是在奠定東亞永久的和平，進而求世界永久的和平。換言之，結束中日戰事不是勝敗的結果，而在期求東亞以及求世界和平之實現，必以中日和平為基礎這一觀點上。

我們深深的覺得，這次中日戰爭的原因，雖然很複雜，但兩國間都有一種傳統思想的錯誤。以軍備來說：因為日本是島國，故需要強大的海軍，正和英國需有強大海軍同樣的理由。但日本陸軍的軍備似在國防需要之上：我們試看英國海陸軍力的比例和日本陸海軍力的比例適成相反；這就使人明白，為什麼日本的陸軍力如此的强大呢？在中國方面看來是日本完全在

時開始的？」我答道：「在近衛聲明以後」。因為近衛聲明在日本方面，有人解釋為日本自始即不是侵略主義的；有人解釋為日本經過反省以後，已放棄侵略主義。無論怎樣解釋，近衛聲明總可以說放棄侵略主義；日本既然放棄侵略主義，我們就開始和平運動。

現在一般人，尤其產業界中人，心中有一共同的疑問：「中日經濟合作是不是藉合作之名，以行獨佔之實呢？」這種疑問中國人都應該有的，中國人都應該對於此疑問予以回答的。換句話說，如果回答道：「不錯的，合作其名，獨佔其實」，那麼和平運動便全然失却意義；如果回答道：「不，中日雙方由合作而得到的利益遠過於獨佔」，那麼，和平運動便是最有價值的運動，不但是救國的關鍵，而且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關鍵。我的回答屬於後者。

為什麼呢？因為獨佔與合作之不相容，猶之侵略與和平之不相容；想在經濟上謀獨佔，和想在軍事上謀征服完全沒有異致。征服的結果，一方面完全壓制，一方面完全受壓制；獨佔的結果，一方面完全榨取，一方面完全受榨取；和平兩字何從說起？日本所謂放棄侵略主義，其所表現的，是在軍事上不謀征服，在經濟上不謀獨佔，必須如此，纔有和平可言。固然日本所謂經濟合作，直至現在，僅僅有近衛聲明所指出的應以平等互惠之原則為根據，還未曾有具體條件和事實的證明；然至少可以說，日本方面已經有提倡經濟合作的理論，和尋求經濟合作的方法之表示了。那麼，中國產業界諸君對之應該怎樣呢？九一八不

準備侵略；同時以近世中日關係史上看，確也不少證明日本以軍事劫奪的行為。但中國不特沒有海軍即陸軍也沒有良好設備；這樣形勢的結果造成了中國人民「畏日」和「仇日」的心理。其次，以政治經濟來說；日本自維新以來，政治和經濟的進步，一日千里而堪與歐美比擬，無疑的是中國的先進；在客觀上，中國政治經濟的改革，因為地理的關係必然以通過日本來吸收為較易，但事實上日本確利用強制性的條約來企圖達到此目的，而這些條約又是以壓力來形成（如二十一條等）。這樣，不但使中國感覺惡劣，且使國際為之不安。其結果，中國政治經濟的改革非但不通過日本，反而厭談中日政治經濟的合作。再次，以文化教育來說：日本是以吸收中國古代文化而介維新以成歐西文化的先進；其教育制度，因種族、文字的關係，理應易於達到一致；但事實上，日本的教育是以侵華、侮華為其目的，未曾致力於中日文化教育的溝通。這樣的結果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並以抵抗侵略為其教育的目標。

我們認為中日兩國，無論在種族上，地理上，歷史上，其政治文化經濟都易溝通和合作，兩國的繁榮和兩國的和平也很易確立。但為了中日最近種種的關係，例如上面所述，竟為兩國和平的障礙。我們雖不信這些是兩國人民間的真意，也不能信為兩國政治家的真意；至少我們可以說，日本過去在形式上是用強力而沒有真誠使中國人民了解。不然，中國決不會被迫而採取遠交近攻的政策，同時中國人民也決不致有非準備武力足以抵抗侵略的偏激觀念。

來，對於日本不願合作，這是事實。七七以來，在軍事狀態之下，更只有將子遺的資本存在租界裏，對於一切產業不能過問，也不願過問，這也是事實。然在今日，日本已有放棄侵略主義的表示，已有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的表示；那麼對於理論之提倡，以及方法之尋求，下一番切實工夫，期於具體條件得以成立，事實得以推進；依我想來，這是必要的。

或者以為從經濟上看來，日本對於中國，除了獨佔，別無他法，無論用何種名目，究竟實際上還是獨佔的；因此對於所謂經濟合作，絲毫不會發生興趣。這是不然的。上頭說過，日本如果想在經濟上謀獨佔，則只有在軍事上謀征服；那麼，其結果只有兩敗俱傷，有何利益可言？經濟事情是以利益為主眼的，獨佔得不著利益，合作纔得著利益，所以只能用合作的方法。須知道，兩個國家如果能從經濟上覓得共同基礎，有無相通，短長相補，則兩國的國民幸福因合作而得到繁榮，兩國的國家關係因合作而得到親密；較之因圖謀獨佔之故，至於相爭相奪，同歸於盡，其利害相去，何止萬里！中日永久和平，惟有經濟合作始能奠定其基礎，這是可以斷言的。

我以為產業界諸君對此時局，不必悲觀，惟有鼓起勇氣，打疊起全副精神，根據著近衛聲明所指出的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來指導經濟合作的理論，尋求經濟合作的方法，使具體條件得以成立，並且有事實表現出來。那麼，中日永久和平的基礎，從此可以奠定。

現在經過二年多的戰爭，大家已覺悟過來了。在日本方面，知道即使滅亡中國也不能維持東亞和平，認識了中華民族之不可侮，所以有近衛聲明且以昭告於世界。在中國方面，也知道了遠交近攻政策是不足以解決中國問題，同時也認識日本的國力是有助於中國的建設，所以有中國國民黨汪主席點電之響應。不但如此，中日兩國又認識了唯平等的友好的和平，纔能支持東亞的繁榮而不受國際動盪的影響或漩渦。

我們以為東亞和平的責任是應由中日兩國來分擔，這基礎纔能鞏固。的確，中國現在的國力是不充實的，我們希望由於日本的協助，使中國自身得以建設而且有利於日本；以中國的地域大物博和人口衆多，不愁不能分擔這重大的責任。不過，由於中日最近三十年間的不良關係，應如何使兩國能彼此互信？我們確認：第一、必須放棄以武力征服或武力復仇的觀念，只在分擔奠定東亞永久和平的觀點上，中日各自充實國防，不以之作彼此相爭的工具。第二、我們必須以兩國彼此有利的情形下，建設整個繁榮東亞的經濟合作，以之避免彼此獨佔的程度，然後兩國的傳統思想得以打破，兩國人民因思想的融和而一致。這樣，東亞永久和平得以確立，世界和平纔有曙光。

大阪每日新聞社因大阪每日半月刊一週紀念，預備出一特刊，慶祝中日反和平空氣的澎湃，索文於我。我覺得大阪每日華文半月刊，負有溝通中日兩國文化，融洽兩國人民思想和情感的使命。際此第二次歐戰激起之秋，我們應秉古訓所謂，一切「建立於民」的原則上，來努力中日和平的基礎，完成東亞百年的大計。因此，申述如上的感想，希希兩國人民互勉，向此前途邁進！

#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

(特稿)

馮 適

## 二 和平的可能及其條件

綜括前節所述，可知中日兩國現在皆不應繼續戰爭，應該立即實現和平。因為戰爭繼續下去，無論在中國或日本，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相反的，如果和平實現，對中國固然有利，對日本也同樣有利。然而前節所述的只是一些客觀的事實，但若中日雙方對於這種事實並未澈底認識，或者中日雙方雖已感覺和平的需要而國際環境却不容許中日雙方接近，則和平仍難實現。關於此點，試再加以考察。

先說日本。在戰事形勢上，日方居於優勢，我方居於劣勢，這是無庸諱言的。居於優勢的戰爭主體，它最有決定戰與和的能力；如果日本毫無和平的意念，和平自然無從談起。但是日本是不是要和呢？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日本不僅現在要和，她是老早老早就主張和了；而且她的要和，是公開的「要」，毫無掩飾，毫不規避。她已經把中日和平的要點定為國策了：日本的國策是剛性的，決不會中途變卦，與通常的政策絕對不同。我們可以說：從近衛到平沼，從平沼到阿部，日本的政治活動，一直是以中日和平為中心而演變的；雖然更換了兩個內閣仍未能把中日和平問題順利解決，雖就目前情形而言，阿部內閣也許不能完成這個使命，可是我們正已看出，繼任內閣將屬於足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近衛一流人物。日本的政治趨向，久已向着中日和平之道成為直線的進展了。

第二，中日兩國的仇恨由來很深，因而兩國之親善提携本難於從事。可是日本資本主義若是沒有中國是不容易發展的，她肯教自己不發展嗎？當然不能。日本又沒有像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那樣雄厚的能力，因而又無法由經濟力迫使中國就範。這樣一個天大的難題橫在日本政治的咽喉之間亦不知若干年，苦悶，憂慮，憤恨，一切煩惱交織在日本資本主義者的腦膜上；這種情況，當然免不了情感之變質。在這若干年中，日本未能在經濟上或政治上解決這問題，於是她不勝其煩惱而暴躁起來了。這種暴躁情緒的發洩，正是出

之於日本軍閥的直覺感。日本軍閥認為既然不能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獲得解決，剩下來的只有武力壓迫之一途了。他以為只要用武力來征服中國，不怕中國不簽城下之盟；日本軍閥是這樣想着，也許另有不少日本人也會這樣想着。由於此一錯誤的想念，便有「九一八」以至「七七」一類武力侵略出現。這種方式雖然是錯誤的，但若中國竟然不堪一擊，惟日本之條件是受，則日本人或許還不覺其錯誤。可是，中國却在抗戰上表露出中國不能屈服，日本不能征服中國。此一表顯，直接打破了日本軍閥的武力侵略的錯誤想念。在戰爭上，中國固然不會獲勝，日本也不能獲得預定的成功。此次戰爭，在日本是冒險，是嘗試，而冒險嘗試的結果乃是犧牲與失敗。日本發現其戰爭手段的犧牲與失敗，因而不得不捨棄戰爭改取和平，也只有走向和平一途，纔能夠尋找她的需要。

單就上述兩點，已可推知日本之企圖以和平方法來解決對華問題，有其必要的與必然的理由，決不是偶然的事；同時可以知道，近衛前首相關於和平的聲明及所有日本在朝在野對於中日和平的表示，也不是虛偽的策略。日本改變其過去的侵華思想，不僅是覺悟，尤可說是政治的進步。如果日本的進步只是片面利己的，那也無庸我們來贊同，正因為日本的此種覺悟與進步，只要中國善於利用，則對於中國亦有同樣的利益，所以我們主張及時把握，求其共同實現。

現在說到我們中國。中國人已經感覺和平的需要沒有呢？就一般民衆而言：他們在兩年有餘的長期戰爭中，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犧牲真是一言難盡；他們現在已感覺到不能再支持下去，所以一聽到和平的消息，莫不聞之色喜，如響斯應。這是和平運動倡導以來的事實。不過，一般民衆之擁護和平，究其動機，大半還不免暫求苟安的直覺感，初無何等高

貴價值。因為中國之抗戰，其目的在於爭取國家之獨立自由；如果捨抗戰以外別無他途可以達此目的，則無論犧牲至如何程度，凡屬國民，皆不應生出爲個人暫求苟安的意念，只有無條件的犧牲下去；但事實未演變到這地步。如前所述，中國固然不能在戰爭中獲得勝利，日本同樣不能在戰爭中獲得成功；中日兩國既皆不能由戰爭來求達各自的目的，那末和平非但有其必要，且亦有了可能。所以，一般民衆之擁護和平，縱然是基於個人的暫求苟安的直覺感，亦頗適合時宜；惟其適合時宜，故一經倡導，便能四海同歸了。

是的，單是民衆方面有和平的要求，若政府當局毫不理睬，則和平仍不可能。再看看我國當局的態度是怎樣：在領導和平運動的汪先生及正統派的國民黨幹部自不必說，即如以抗戰到底爲口頭禪的重慶當局，他們也一再非正式的表示其企求和平的意念了。當然，重慶當局的知識未必比我們低陋；他們對於中國不能支持戰局的實情，對於中日和平與中國有何利益，對於日本何以主張和平——他們對於一切，也許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所以，重慶當局的和平表示雖然是非正式的，甚至他們在既經表示之後又自行否認，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漠視他們的和平需要。

總之，中國全國上下，沒有一人不主張和平了。日本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這就是和平的最大的可能性。和平既有可能，何以並未如期實現呢？這個癥結還是在重慶！因為現在的重慶當局受了兩種惡勢力的包圍脅迫：一是藍衣社的獨裁勢力，是蔣介石把持的；一是共產黨的搗亂勢力，是蘇維埃操縱的；而蔣介石又爲共產黨所劫縛。這兩種惡勢力，一起先是不要和平，現在雖想和平但是不願意真和平之實現；

因為中日的真正和平一旦實現，蔣介石將無從繼續其貪婪暴戾為所欲為的黑暗政治，蘇維埃將無從破壞中日兩國的國力，共產黨將無從逞其跳樑惡技了；因此他們便用兩種手段來阻礙真和平的實現：他們一面想盡方法來攫取中國方面的議和權，以為繼續其踩踐中國的張本；此計不售，便又一面想盡方法製造各種謠言來誣蔑和平的真理，企圖打消中日和平的實現。我們對於他們的第一種手段是不以為懼的，因為他們的正面的罪惡已足抵銷其攫取議和權的野心；惟有第二種手段是一種毒計，必須提防；因為他們在巧言善辯之下所發出的謠言，也許能迷惑一般淺見的民衆的心理，不免搖動和平運動的基本勢力，所以不得不加以提防。

他們最惡毒的謠言，是說日本的言和是假的，是變相的侵略，叫民衆不要相信她。他們看中中國民衆對於日本的疑懼心理，對準這種心理加以利用，可說是他們的得意傑作。

誠然，如果日本言和是假的，或者居心雖真而和的條件並不平等，當然對於中國極其不利；我們忍見中國再在和的上面蒙受極大的不利嗎？現在來看看日本的和平條件是否含有此種因素。

日本所提出的具體的和平條件，可以近衛聲明中的「親善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攜」為代表。第一，所謂親善友好，是相對的，平等的，既無恩惠意味，亦無義務性質；兩國既已恢復正常外交關係，自不應再相敵視；兩國要想增進國交，自必以親善友好為態度。第二，所謂共同防共，乃是共同防制東亞的禍患，保衛東亞的治安；共產黨之禍國殃民，乃是中國十數年來的事實；中國經此次戰役，實力大損，固然談不到防禦蘇聯的遠東紅軍的赤化勢力，即欲恢復十七年以後的剿共能力，亦非短期所能做到；在此情形之下，

與日本兵力協力以防制共產黨的蠢動，對於中國正是十分需要的。第三，所謂經濟提攜，乃是平等互惠的；二十八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明白指示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是中國可以接受的了；蔣介石及王外交部長又不知照樣說過多少次。實在，平等互惠的經濟提攜，中國不僅可以接受，而且是需要的，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正需要外力的協助。總之，這三個原則實無可以訾議之點。可是我們又不得不注意：原則只是原則，只是大體的輪廓，只是抽象的理想；其實質還要看具體辦法如何。如果所訂辦法未能符合原則的根本精神，則中國在和平結局中仍有被侵略之可能。例如：在親善友好一項中，如果暗示了主從的關係，則中國便得不到平等；在共同防衛中，如果種了日本武力可以任意行動的因素，則中國便不能自由；在經濟提攜中，如果限定了中國經濟組織的機構，則中國還是處於被剝削的地位——凡此皆足以招致中國再被侵略的危險，必須注意。可是，這是問題的不好的一面，它還有另一較好的一面，可以做到中國不被侵略。如何便可以做到？這就靠主持和議大權的當局的努力。

和議席上的努力，將比戰場上的努力更為重要；一字一句之差，便足以亡國。在和議中，為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平等，當不惜誓死抵抗；任何辦法，凡是含有中國被侵略的危機的，絕對不容遷就；例如，上述三項之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經濟提攜，如果提攜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國寧可爽截承認賠款纔見着反正高低；但若中國避不言和，那末，縱有真正的獨立自由平等存在其中，難道教日本人無條件的送上門來嗎？

在上述三項原則之外，日本方面亦曾正式或非正式的聲明過下列幾點：（一）日本不以戰勝國自居，不要求中國割地

賠款及限制軍備；這種態度不可不謂為寬大。中國過去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失敗之後，沒有一次不受到割地賠款及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種種壓迫；德國在凡爾賽條約中也同樣受到這些壓迫的。（二）日本尊重中國主權行政的獨立完整。這種表示，其精神與九國公約相同。其實質則與九國公約相異。九國公約中的尊重中國主權行政的獨立完整，是以門戶開放為手段；而所謂門戶開放的結果，表面上雖是保持中國獨立完整的軀壳，實際上是在無形中為各國所瓜分。門戶是中國的，開放與否是中國的主權，何以要由別國越俎代庖呢？可見九國公約的本身就沒尊重中國。現在日本之尊重中國與否，只要看前述三原則做到怎樣；如能做到真正平等，則日本所表示的尊重並非飾詞。（三）日本願意考慮取消領事裁判權及歸還租界。所謂攷慮，自然尚在可否之間；但是我們對於日本的此一態度，覺得更能表顯日本對於中國的誠意；因為領事裁判權及租界都由不平等條約而產生的，是過去的事，與今次事變無關，日本大可不必提及；現在她居然提及了，倘是我們善於把握，促其實踐諾言，則中國正又可因禍得福了。（四）撤退在華駐軍不生問題。一般民衆所最疑懼的就是這一點，深恐戰爭雖停，軍隊不撤，中國仍有再被壓迫的危險；一旦日軍撤退，我敢說，中國人民將立刻對日發生好感，所以我們也希望日本能迅速做到。不過，要日本撤退駐軍，首先要中國接受和平提議，由接受和議而停戰，由停戰而正式談判和平，和平談妥之日，纔是日軍撤退之時；若謂日軍先行撤退而後再行談判，古今中外，無此先例；應守的分寸我們也應遵守的。

以上所述的，是中日雙方皆已有和平的企圖，故和平的可能已有最切實的基礎了。不過，中日和平問題並不是單純

的中日兩國的事，同時與其他國家也有相當關係。這些有關係的國家，為了本身在遠東的利益，不能不注意中日間的和平問題。就是說：中日和平的結果若對她們極其不利，則她們必然直接或間接來阻擾反對；反之，若結果亦積極的與她們有利或是消極的與她們並無何等不利，則她們縱不贊同，亦不致反對。試簡略觀察：

第一，任何國家，皆是不願意自己參加戰爭，也不願意自己的與國參加戰爭；她們不僅為了人道主義，尤其為了戰爭會直接間接損毀她們的權益。英美法德各國在遠東的權益不為不大，同時她們在中日戰爭中所遭受的損害也就不為不多；中日和平早一日實現，她們的權益便得少受一分損害。而中日戰爭延長下去，非但她們的權益將繼續犧牲，且有因此而使各國原始的態度而言，她們皆是希望中日和平及早現實的（除了以煽動戰爭為務的蘇聯）；她們更希望着中國在和平之後仍能獨立生存，因為中國是她們的經濟生命線之一大環。第二，各國對於中日和平問題也有一個顧慮，就是恐怕日本從此獨占中國經濟市場，把她的權益排除淨盡。關於此點，無論中國是不會這樣做，即在日本，也會聲明並不排除第三國在華的正當權益。本來，各國的在華權益，大部分是特殊的，是與中國不利的；如果中國趁此機會，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與各國調整關係，亦屬必要。任何國家沒有理由可以拒絕中國的調整提議，同樣任何國家沒有理由可以反對合理的中日和平。

我們從本國，從日本，又從國際各方面檢討，深知中日和平有其必要，亦有其可能。必要而且可能的事，還不該努力以赴，促其早日實現嗎？（本節完、全文未完）

## 蘆變以來日本在華經濟行動一般

程巨卿

九一八事變，日本採取了滿洲的經濟權後，便進一步謀在華北發展其強大的經濟勢力。數年來所高唱的「經濟提攜」，在中國人看來，都不免懷着一種「變相的經濟侵略的新手段」的恐懼心理。開發華北的口號，我們遠在蘆溝橋事變以前就聽到了，而且沿襲其滿鐵會社的慣技，早在華北設立「興中公司」。七七事變以後，日人跟着其武力的進展，由華北推到華中，開發的口號就散播到華中了。並且於昭和十三年（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七日，根據第十三屆國會議決，正式成立了「華北開發會社」，以代替「興中公司」，專負開發華北的責任，又根據第七十三屆的國會決議，正式成立了「華中振興會社」，專負開發華中的責任。

這兩個會社的組織，不但是經濟侵略的大本營，而且含有政治上的意義；所以稱之為「國策會社」。阿部賢一曾經這樣說過：「數年前，蔣介石將軍曾推斷中日間發生戰爭時，將經三個時期：『最初的第一期內，日軍將恃其精銳的武器，在一二年內佔領中國的大半土地；其次的一二年為第二期，此時中日兩軍的對抗，入於膠着狀態，相持不下。日本既在大陸上囤積大軍，而不能返國參與生產工作，是則生產銳減，消耗無限增大，終使其財政經濟陷於破產之局面。於是中國乘機崛起，大舉反攻，而入於第三時期，並將日軍逐出，獲得最後勝利』。然在日軍一面討伐，一面在佔領區域內着着建設之後，則蔣氏之言，終成夢想；是則大陸經營的成敗，關係日本國運的前途，其重要不言可喻了。」

所以日本這次要想完全戰勝中國，主要的還在於建設中國的淪陷區域。換言之，即是主要的還在把政治進攻孕育於經濟進攻的胞胎之內。

這兩個會社的主要任務，是在獨佔市場；此外經濟進攻的最大目的，便是搜括淪陷區的農礦等生產物，作為他的軍需資源。講到這點，最為我們所重視的，是華北的棉花，每年輸往日本的，值一萬萬元以上；長江流域的米，最近被其裝載以去的要在百萬擔以上。而他對於華北的棉花，尤竭力設法增加產量，其增產計劃如次：

今後九年增加華北棉產之計劃（單位：一千担）

年份	美種花	土種花	合計
一九三八	二、二四六	一、九五八	四、二〇四
一九三九	二、二四九	二、一五四	四、六五三
一九四〇	二、八〇三	二、三六九	五、一七三
一九四一	三、四七〇	二、三五七	五、八二七
一九四二	四、一九九	二、三四三	六、五四二
一九四三	五、〇七〇	二、三二七	七、三九七
一九四四	五、九七二	二、三一〇	八、二八二
一九四五	六、八三七	二、三五九	九、一九七
一九四六	七、六六五	二、三三五	一〇、〇〇〇

（註）根據日本「棉工聯」第三十九期。

關於關稅一項，自戰後至去年（廿七年）底止，被日本截取的，共計一萬五千萬元（最近的尚無詳盡的統計）。內江海關計八千四百餘萬元，津海關五千六百餘萬元，秦海關、膠海關、東海關的數目亦頗可觀。

日本最迫切希望的，還是在於建設淪陷區的工業。先說鐵工業：日本急於解決國內生鐵缺乏的問題，自佔領華北的龍煙鐵礦後，就積極進行開展。該礦為中國大礦之一，產量僅次於遼寧的鞍山，而貿易且過之。該礦儲量約八千三百萬噸以上，約占中國鐵礦總儲量百分之八。華中的鐵礦，日本雖也積極進行，但是目前情形，正如軍特務部建設科長佐藤少佐在「華中之建設現狀」的演說中所說：「自開辦以來，對採掘數量，因受治安之影響，未採得大量的礦石」。煤工業呢，在華中的幾個淪陷省區內，現被日本所佔有的，共有二十六所最大的煤礦。這些煤礦所蘊藏的煤量，約為一一、二〇〇百萬噸，占全國總數百分之五七・九九。其採掘量約一千七百五十萬噸。所以這些煤礦，日本如能全部恢復採掘，則其煤的供給，便可全部解決了。但是這些煤礦，大多數都在游擊隊的滋擾與控制之下，或因中國軍隊退走時予以盡量的破壞，使日人至今尚無法開掘。華中的煤礦，如安徽的淮南、長興等煤礦，也是同樣情形，使日人一時得不到好處。日本目前可積極推行建設的，要推紡織業。他還利用目前我國資本家因受戰爭影響而無法投資的時候，不僅竭力恢復原有的在華的日商紗廠，而且羣起爭奪戰區內現存之華商紗廠的合作權，硬拉入日商紗廠陣容之內；如華商紗廠不甘與之合作者，即由當地日軍予以「軍管理」，逼其移交日廠經營。因此，目前戰區內的紡織業，還全部為日商所獨占。此外戰區內的麵粉、水泥、化學等等工業，凡原屬華商的，除完全毀滅外，均被日方用「軍管理」的名義加以佔有。這些都是足以使中國民衆疾首痛心的。但是這些外表上的獨佔，收效是極微的，這在佐藤少佐也已說過：「離開開發的目的尚遠」。他又說：

「紡織業方面，本為華中重要之產業。其受戰爭影響最大者，亦莫過於紡織業。故此後亦為急待恢復者。然對於恢復紡織業，有三大阻礙：一、戰前中國紡織業，恐戰爭發生後，其工廠為日軍所沒收，因變其名義為英美商人所有，藉以避免沒收；二、紡織業者逃難於香港或外國；三、紡織業者恐抗日分子施行恐怖行為，故不欲恢復其舊業。這三點是恢復紡織業最大阻礙。然日本仍然努力期待中日合辦實現。」

「製粉業，為亦屬重要之工業。上海、無錫等地，以往甚多製粉之工廠，戰事後，關於此業，因日本之致力於製粉業之研究者尚未來華，故對華中之製粉工業，因缺乏指導，尚未能開始。」

「硫酸業，為一種肥料上之重要化學原料，南京對岸的浦口，本有硫酸製造廠。但因其受戰事影響巨大，致該廠不易恢復。」

日人所謂開發與建設的工作，其成效如何，我們看了上面所說，亦可知其大概了。照理，在武力控制之下，自可為所欲為，得心應手地進行順利的。但結果遠出所料，又是什麼緣故呢？以中國地區之廣，人口之多，社會情形的複雜，若日本欲以完全侵略的方法，達其獨佔的志願，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日本要想在華獲得經濟上的出路，非以最大的誠意，與中國以平等互惠的原則，真誠合作，則一切不但徒勞無功，並且前途的危機，更不堪問。因為今次的戰爭，業已大錯鑄成，耗損了不少的實力，至使中日兩國以至整個的東亞都蒙受重大的打擊。我們應該趕快作亡羊補牢之計，把近衛聲明與汪先生和平主張，盡力使之實現，日本則更應澈底覺悟，完全放棄其過去以侵略為目的的任何政策，那末日本前途，自有無限光明，中日親善，可持之永久而無間了。

# 從經濟地理檢討中日經濟合作之方式

赤峯倫介著  
西荅譯

——譯自世界週刊十月特大號原題為「東亞協同體與經濟地理」——

世界的現實狀況，以遠東問題與歐洲問題為中心，很快的向着新的姿態轉變着。在轉變的渦流中，任何國家再不能獨善其身的保持其老的樣子，她們是被強迫的而把自身納入新的姿態與秩序之中。世界地圖的色彩，就是這樣不管地理的自然的相貌，時時刻刻在被塗改。

最近以前，世界的觀聽，是集中在以中日事變為中心的遠東問題上——不管她們對於遠東利害關係多或少；但是自從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締結，前此以英法蘇合作為基調以包圍德義的那種體制是破壞了，接着是希特勒進攻波蘭與英法對德宣戰，於是世界的視聽線忽然轉注到歐洲的破局。這在我們遠東人士也就這樣着想：遠東問題將以歐洲的破局為契機而採取何等積極的解決的方向吧？有些日本人甚且把這種情勢當做是天賜良機，以為第一次歐戰時的好運道又來了。

但是，戰了二年幾個月的中日事變，有沒有發見迅速而容易的解決之途呢？

阿部新內閣是在所謂新的理想與新的政策之下而產生的。新政策的出發點是以處理中日事變為第一義，而處理事變的中心課題，不用說，是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也就是負起世界史的使命。

中日事變的世界史的意義，就空間來說，是由東亞之統一以促成世界之統一。可是東亞之統一，若是仍舊持續過去

的封建關係或是回到以前的封建狀態，那是做不到的；必須認清使半封建關係中的中國近代化，才是東亞統一的前提；日本不可企圖中國局部的開發，應該助成整個中國真正近代化。中國欲求近代化，必須脫却近代資本主義的弊害，走上新的途徑。使中國從歐美資本帝國主義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才可以達成東亞之統一，日本應該在此次戰爭中深深認識這種意義。從而，日本不可代替歐美諸國而由自己來實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日本自己也當以此次事變為契機，確立一種超資本主義經濟之營利主義的新原理，這才是實現東亞統一的最要之一着。實在，解決資本主義自身之內所萌發的內在的矛盾，乃是世界任何國家所當從事的最重要的課題；所以，中日事變的意義，就時間來說，也就是在於資本主義問題之解決。在空間上，東亞解放與統一之實現，在時間上，資本主義問題若不能獲得解決，東亞之統一仍然不能實現。

建設東亞協同體的理論的出發點，就是在這兩個問題的關聯上。

## 二

欲從歐美帝國主義解放出來以實現東亞統一，須有特定的現實地盤。這種地盤，是指在由地理的自然的境界而區劃的自然地域上，建設由法制的意味而區劃的政治地域。這就是說，利用並克服自然的諸條件以施行歷史的轉變。目前東

亞的地域，不妨暫時假定中日「滿」為範圍。

現在先一說中日「滿」的自然構造如何。

元來，日本及其所屬各島，在先期地質時代，是接續在大陸的東邊而形成大陸的邊緣的。這個大陸塊，因地球之反復收縮所起的二大造山運動（即地球造褶的物理運動）而分離。其一為環太平洋造山運動，其二為喜馬拉雅地中海造山運動。環太平洋造山運動以太平洋為中心，由海洋部分的曳引作用，沿着東亞部分的地球內部的不連續線，生出三個系統的隆起帶：

(一) 島弧系統——亞魯特弧、堪察加、千島弧、本州弧、

朝鮮、九州、琉球弧、台灣、菲列賓弧；

(二) 海岸系統——西奧達山脈、東滿洲山地、山東半島及

山地、中國南部山系；

(三) 內陸系統——南斯塔諾尾山脈、大興安嶺、太行山脈

、秦嶺山脈、雲貴高地。

至於喜馬拉雅地中海造山帶，在東亞部分和前一造山帶

各系統有着相當幅員的接近，造成喜馬拉雅、崑崙、天山、薩彥等所謂構造山脈。在這一個大陸塊的地球表面的一部，便形成中國、滿洲及日本的主要骨骼。由此種情形所形成的東亞之骨骼，又因不斷的地形之輪迴而形成複雜的地形。在中國，形成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粵江流域的三個平原；在滿洲，形成松花江及遼河的南滿平原；至於朝鮮及日本諸島，則在脊嶺山脈之間有不少河川，形成流域及海岸平原。

除了上述的地形構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自然構造是氣候的條件。

東亞的氣候條件，代表的特質是同在東亞細亞季候風的影響之下。這種季候風，在夏季，從西南海面吹向大陸；在

冬季，正是相反，從西北大陸吹向東南。前者溫暖而含有多量的溼度；後者則乾燥而冷。它們是決定氣溫和雨量的主要因素。

中國的主要地方在北緯二〇至四〇度之間，與西班牙及北非撒哈拉沙漠同緯度，但溫度較此等地方為低。北平雖與意國拉普勒斯同緯度，但年平均氣溫，後者十七度，前者不過十一度。廣州差不多是在北回歸線上，年平均氣溫為二十一度，但與之同緯度的埃及南部則為二十六度。又甘肅及華北的諸河川，冬季結冰期約六星期；在滿洲，每年有四個月乃至六個月的冰期；這些地方的雨濕，也因為遠離海洋而呈乾燥。廣州地方的雨量，年平均二〇〇釐，華中為七五至一〇〇釐，華北僅二五至五〇釐，新疆地方還不到二五釐。

由上情形，可見中國具有亞熱帶與溫帶的中間特徵，而其夏季與冬季的氣溫的變化也很大。由於夏季幾個月的多量降雨及降雨量之分布，支配了中國河川的水量，這便成為中國以灌溉農業為特徵的主要條件。

滿洲亦受到東南亞細亞及西北利亞之間的季候風的影響；有酷暑的夏，又有大陸的嚴寒的冬。此種特質，對於植物的生育，較之華北更為惡劣，植物的種類因此不多。灌溉農業亦僅限於南部遼河平原一帶。

日本也是相像：夏季的季候風，因是暖流而使氣溫上升，雨量亦多；冬季的季候風，因大陸方面的寒波，帶來霜雪和寒冷。而且，日本又因其「裏日本」與「表日本」的地勢的不同，氣候亦隨之而異。加之緯度很長，氣候亦有很多差異。從極北部分的庫頁島到千島及北海道，是季節風帶；其後便漸次移向大陸氣候地帶；至於南方台灣及南洋諸島，則具熱帶的特質。不過就一般而言，較之大陸氣候，夏暑較柔，冬

寒不凍，雨量亦很多。又因有充分的晴天與豐足的雨量，適於多種植物的繁茂；許多河川流域的沖積平原、海岸平原、運積盆地，扇狀地及火山山麓等，皆是可耕之地。

上述的氣候條件，直接決定了動植物的分佈。東亞的植物分布，主要是夏季闊葉樹及混合森林、草地、常綠亞熱帶叢林。日本從中央部到北部，是和西北利亞日本海沿岸、朝鮮東部相同；從中央部到南部，是和中國中南部相同。動物的情形也至如此：中國的動物分類有（一）華北的蒙古型即半沙漠型（二）西南中國的喜馬拉雅型（三）華南一帶的東洋型（四）以上的混交型等四類，華北及滿洲，則為歐洲西北利亞型及純西北利亞型。日本的動物分布也和中國相似，即北部多西北利亞型，南部多東洋型。

分佈在這種氣候條件之下的動植物羣，被利用為生活的手段，便形成東洋人的社會生活；這種生活，也就是與其他地帶得以明白區分的特質。更因社會生活之發展，施行改良與選擇，於是動植物的自然分布又漸次進為人工的社會的分佈了。當然，這種進展與中日滿的經濟能力之分配是有重大關係的。

此等動植物的繁盛又礦產的蘊藏及動力的利用，不用說，乃是東亞所豐富存在的自然資源。關於此等自然資源的新分配、開發、利用等問題，必須建設新的秩序，同時要把握生產力的擴充確立高度的計劃化，而後使供應合理的應用。如上所述，東亞由其自然構造為前提，決定了灌溉農業的生產關係；在灌溉農業上構成了「利害協同體」（Common Interest）的性格的東亞社會。

## 三

東亞灌溉農業社會的「利害協同體」的性格，與西洋的「社會」（Society）的性格，是對比的。東亞社會是以家族主義為本位。「家」是一切集團生活的中心。家長司祖先之祭祀，同時維持家族員的生活。家族員對於家長，盡其忠誠，以孝為本，為了家族的共同生活，在家長的指導之下，從事耕作。這種生活的原理，是以家族為中心，具有倫理與政治之統一性的特色。

然而，此種利害協同體的東亞灌溉農業社會，因自然力利用方法及地理的位置之不同，而發展為兩種異型：即中國的性格與日本的性格。

中國的中央集權等制度，曾經幾度輸入日本，作為新的政治方法；但是到了日本之後，是經過修改而後實施的，故與原物實大異其趣。中國的佛教，也因為日本的推敲改編而有許多派別；儒教亦然。不僅文化上，在政治經濟及技術各種關係上，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到現在來檢討日本的性格及其各種成果，上述情形不期然而顯示在我人的眼前。

中國的性格與日本的性格之相異，在封建社會的過程中很可以看得出來；而在歐洲資本主義侵入東亞社會以後，是尤其顯著了。

中國在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及江寧條約締訂以後，一面是由封建步入近代化的擬態，可是在其本質上，却是開始走入歐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化。農民受着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的縛束，耕種零碎的土地。民族資本是成為歐美帝國主義的買辦，同時和它結合起來，也僅僅在這種結合的關係上才能生存。另一方面，被掠奪於殖民地政策的中國民眾，却在蘇聯共產主義的勢力之下組織起來了。

這樣，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政治地理鳥瞰圖，便帶了國

度的複雜性。

日本當明治維新的變革之際，立在歐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化的危機之前，用了蓄積下來的資本，開始近代的武裝；同時，由於歐美帝國主義的質的轉變，獲得不少有利條件，這才脫却帝國主義的桎梏，走向近代的發展之路。

上面所述的，就表示了東亞灌溉農業社會的利害協同體的性格，實具有中國的性格與日本的性格的二重性。但是，這種二重的性格，並不是表示在「質」的方面有什麼相對的不同，乃是表示中國與日本在歷史的發展階段上有其不同。明白這一點，便可明白提倡東亞統一的基本性質，同時亦可知道日本在東亞解放的運動中，除了有其相當的領導地位之外，對於中國並沒有什麼其他不同。

前面曾經說過，若不把現實的歐美列強對於東亞的支配勢力除去，中國是不能獲得解放，同時以日本為倡導者的東亞解放也不能實現。

現代亞洲的諸民族，皆知脫離歐美帝國主義之支配的必要了，她們皆已向着民族自立的歷史課題之解決的大道前進。近年以來的國民運動的方向，常常利用各種機會，想從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掙脫出來，表現出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一再要求把半封建的中國發展為近代化，喊出脫却歐美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的口號。共產黨更是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為第一義的。然而試檢討此等國民運動的結果；共產黨是以蘇聯的策劃為策劃的，固不必說，而國民黨呢，它也未能成為把中國從帝國主義列強解放出來的惟一武器；這些國民運動的成績，倒是教帝國主義各國的支配勢力愈加強化了。這真是東亞解放運動上的一大不幸！但是以解放東亞為職志的日本可以因此而以中國四億民衆為

敵嗎？

#### 四

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政治地理的現實中，英美法諸帝國主義及蘇聯共產主義，各各為其本國政治的經濟的利益，運用其近代武裝及經濟壓力，以強化其支配勢力。因此，她們之間的一國，要想獨占中國，頗為困難。若是某一國要想獨占排他的支配勢力亦必來反對與攻擊。中國便這樣在九國公約之下被分割為次殖民地了。在這樣的政治地理的條件之中，他帝國主義諸勢力亦必來反對與攻擊。中國便這樣在九國公約之下被分割為次殖民地了。在這樣的政治地理的條件之中，日本竟敢揭起東亞之統一與解放的旗幟，試問日本可以再存帝國主義的心理假借名義以侵略中國嗎？當然不可，亦不致如此。日本惟有與中國共同對待帝國主義及其產主義，從事共同防衛共同開發的工作。這就是說，中日兩國應該確立一種與國防經濟有密切關係的地域的協同經濟，形成東亞經濟同盟。

形成東亞經濟同盟的原因，可分內因和外因兩種：

先說外因：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後，經濟同盟已成為一種自然的趨勢，故東亞亦有結成經濟同盟之必要。第一次大戰後的帝國主義列強，莫不企圖軍備之重建與自給自足之確保，確是事實；但是中日事變之後的建設，並非帝國主義軍備之重建及殖民地之再編成的建設，所以未來的東亞經濟同盟與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同盟亦不相同。因為日本資本主義雖已達於獨占資本主義的階段，可是日本資本的蓄積量是居相對的低位，資本主義的構成亦含有脆弱性，並不具備英美法的帝國主義資本的完全資格。就日本本身的經濟組織及其能力而言，要想拿資本帝國主義的姿態來侵略中國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今次事變決不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侵略戰，

乃是企圖根本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要在東亞建設經濟的協同體。

至於內因：（一）由於中日「滿」共通的自然條件，（二）由於中日「滿」政治形勢的相關，（三）由於民族上的共通點，（四）由於豐富資源的存在，（五）由於交通發達的地理需要。這五個原因，如果只有其一二，還不能決定建設經濟同盟的必要性；惟其諸多條件皆有其必要，這才顯示出東亞協同體的歷史的現實的意義。中日「滿」三國必須澈底認識這些特質與需要，解決這個歷史的課題，而後才能實現真正的東亞統一與解放，及協同體之建設。

要實現東亞之統一與解放，必須有現實的地盤。這個地盤，就是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成立的東亞灌溉農業社會。東亞灌溉農業社會本來是具有利害協同體的性格的，但是因為封建社會的歷史的進展而生出中國的性格與日本的性格；這兩種性格，在歐美先進資本主義侵入東亞以後，更顯出個別發展的姿態。中國方面是顯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性格，日本方面是向着資本主義急速發展。不過，中國的性格與日本的性格雖有其不同，但兩者本來却是灌溉農業社會的利害協同體的性格，那是無可否定的。我們現在要想統一東亞，要從歐美帝國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建設東亞協同的現實地盤，必須以地理的自然條件為前提，構成利害協同體的灌溉農業社會；這就是東亞民族的責任。同時可以知道，此次事變之後的日本的行動，決不是也決不可以代替歐美帝國主義的支配勢力之侵略，尤須對於她們採取共同防衛共同開發的方針以建設新的東亞。真正以共同防衛與共同開發為目標的東亞協同體之建設，必須解決所謂東亞之統一與解放的空間的地理的問題，同時解決所謂東亞資本

### 主義之解決的時間的歷史的問題。

要實現中國之解放與自立，就須注意中國資本主義的問題。不用說，中國資本主義之自立，必須從歐美列強帝國主義的羈絆解放出來。不過，中國資本主義之自立，與日本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可混為一談；前本是中國之解放與中國資本主義的問題，後者是中國資本主義與日本資本主義的問題。

第一，中國資本主義的現實的課題，在於次殖民地狀態的解放及半封建關係的終止。次殖民地狀態的解放，對於中國民族資本的正常發展，是絕對必要的條件；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立的發展與中國民族的政治的解放，當然有相互的關係。然而，中國資本主義在從次殖民地的狀態下解放之後，並不是立刻能夠通過中國農村經濟而把半封建的諸關係予以終止的，因為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尚在相對低位的程度。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在日本先把自己的資本問題解決，而後把新的機構、技術、資本協助中國，中國才有根本解決之可能。

其次，日本資本主義的問題解決之後，若是利用資本以為武器，不是與中國協調解決封建關係的問題而是變相的侵略中國，則中國固不能脫却半封建狀態及殖民地狀態，即日本所倡導的東亞之統一與解放亦終不能實現。所以日本為澈底解決東亞問題，必須把日本資本主義的自身機構同時續行質的轉換，向着東亞協同的性格施行再編成。

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的新體制的再編成，在於協助中國民族資本，使它能夠從歐美列強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次由日本的協助與合作，導入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方向；再用日本的新農業技術及近代工業機械，以終止中國的半封建的諸關係；這樣才能完成東亞的共同開發與共同防衛。東亞，一面在建設協同體，一面更以其新的地理的意義，向着建設世界的新秩序前進。

# 答中國諸君

(上)

——轉載中華日報——

最近拜讀了在「中華日報」及「中國公論」上發表的給我的書信，謹以本篇奉答中國有識之士。本文為最近即將出版之拙著「和平論」一書中之一章，並以聲明。

中國諸君：

從這回的事變開始以來，我曾經屢次論及貴國與日本的關係。我相信，關於我對於貴國國民的友情，至少若干有識之士，是予以理解的。

我自己在貴國國民中感到眩惑陶醉的許多東西，想到了北平的充滿着優美的文化氣象的空氣，我真想永住住在那個古城之中。看到貴國青年，從長久的沈眠中覺醒，以瀰漫橫溢的熱力而起來，也不作爲是在外國發生的事件而看待的。

貴國人像在想日本一般人常是輕蔑貴國人的樣子；我最近讀了周佛海氏的某一篇文章，重愕又驚愕了。我決不因此吃驚而否定周氏的見解；反而是因此使我想起了我所遺忘的東西，同時成爲

作自己反省的好刺激，是可以感謝的。

在日本的一部，尤其在無知識階級中，的確有不少輕蔑貴國人的。這可以說是甲午之戰的戰勝，所遺留給我們的頂不快的遺產之一。在我們這樣的年輩的人，的確有此種惡風；較我們後一代年輩的人，也受着這惡風的遺傳。我們承認這是事實，並且深以爲恥。但同時

此種對於貴國的輕蔑，亦已漸次淡忘；而在知識階級之間，則差不多已銷形匿跡了。只看貴國之文學與思想，揭載於日本的諸高級雜誌，用尊敬之念來閱讀，便可以明瞭的。

二

中國諸君：

我對於貴國的友情，還有講說不盡的。我對於貴國的友情，還有講說不盡之感。我自己嘗學習西歐的思想，西歐的思想，給我引導，給我啟蒙，給我燃燒了。我現在仍還想，尚有若干地方是應該

，已由西歐的移到東方的了。貴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的名字，在貴國的青年看起來，或者以爲是反動思想家而付諸一笑，亦未可知。但我以為此思想家在使我們從西方的轉向東方的一點上，已是盡了其爲一個先覺者的責任了。

我曾披讀了貴國的許多古籍，會以現代語翻譯論語及莊子，寫了孔子傳，老子也是我愛讀書中之一。此等古書及古昔聖賢所給我們的教訓，是怎樣的偉大，只有以驚異之情方可以表出來的。此等古昔之聖哲賢人，及文人學士，是使我嚮心貴國的，可不必說；但在我心中最占重要占有指導的地位，乃是在於此保有古文化與傳統的四萬萬國民，將從長久的沉眠中覺醒轉來，而達到自己更生的現實及其未來的光景之中。講堯舜的時代也好，談孔老言論也好，回顧孔子所贊美的郁乎周代的文化也好。孔子自己也會說「吾從先進」。從先進學習之必要，是不待說的。貴國之青

室伏高信

年，倘有人徒然心醉於西方的思想與文明，而忘却貴國所有五千年悠長的歷史，及只能由此悠長歷史所產生的民族之自負，則我們只能說這些人還是存活於十九世紀的空氣之中的。但是此種悠長的歷史、文化及傳統，誰說是只不過爲鑑賞、爲培養復古的反動精神、爲停止進步而作爲鴉片式的存在呢？

我自身先前學於西歐，而自謂是超越了西歐的了；貴國本來也應得先從西歐或美國，或竟是蘇聯去學習的。但從他們那裏去學習，應得並不是要做他們的文化殖民地之意。我們先要從西歐學習，而吸收其一切善美的；同時更不可不通過自己的固有文化及傳統，而超越之；由超越而綜合之；由綜合而創造新的物事、新的自己、新的東方。

這是我們的任務，同時也是貴國有識人士的任務。在古昔曾經一次光耀燦爛的東洋，再去導出新的光來，可用這個光來照射世界；我以為是今日的東方人所應負荷的榮譽的任務之一。

年，倘有人徒然心醉於西方的思想與文明，而忘却貴國所有五千年悠長的歷史，及只能由此悠長歷史所產生的民族之自負，則我們只能說這些人還是存活於十九世紀的空氣之中的。但是此種悠長的歷史、文化及傳統，誰說是只不過爲鑑賞、爲培養復古的反動精神、爲停止進步而作爲鴉片式的存在呢？

到了太悠遠的未來，因之與日下的問題相懸絕而視為不過一種空言虛辭，亦未可知。對於需求着麵包的，給以達文西或米萊的畫，如何能得滿足？關於這一點，我自己是很明白的：貴國現在求着什麼，熱烈要求着的是什麼之點。

簡單明白說來，貴國今日所要求的是獨立，是自由，是解放，是平等；國民革命之目的，就在於此。貴國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而奮鬥，並且繼續奮鬥着來的。

我們深信並且知道貴國現在的青年，有十足的愛國心。但是以前貴國不曾有缺少愛國心的事嗎？在中日戰爭當時，貴國官僚之腐敗達於極點，一般民眾也不關心着國家，而汲汲於私人的利己的事務，不是這樣的嗎？不但如此，就是自今，貴國中的買辦，這個買辦的日本人富於愛國精神，並且知道尊敬一切的愛國者；在日本最尊崇神道的，因而被視為神道的，不是大學者，也不是大政治家，也不是大實業家，也不是大藝術家；日本人尊敬且崇拜愛國者高出一切

人不愛其國家的道理；日本人知道尊敬——納爾遜像他們知道尊敬東鄉元帥一樣。

—40—

我們尊重貴國的此種立場。國家倘使沒有獨立，更還有什麼話可說？我們日本人富於愛國精神，並且知道尊敬一切的愛國者；在日本最尊崇神道的，因而被視為神道的，不是大學者，也不是大政治家，也不是大實業家，也不是大藝術家；日本人尊敬且崇拜愛國者高出一切

人不愛其國家的道理；日本人知道尊敬——納爾遜像他們知道尊敬東鄉元帥一樣。

## 日本不能征服中國論

Hallett Abend  
劉 錄 譯

—由 American Mercury —

在兩年多對華的戰事之中，日本那些慘重的犧牲和消耗，在目下看來，似乎都是白費了；她的軍隊過去一切輝煌的勝利，也似乎不能使她獲得最後的勝利，而且她那些表面上的征服工作，恐怕亦將化為烏有，不能獲得其所希望的利益。事情何以如此？其原因安在呢？沒有別的，這一切都是由於日本缺乏那種殖民國家所必備的政治能力。他們那種以武力統治一切的意志的背後，缺少一種能力，可以管理人民，而使人民並不感到痛苦，並可以收服殖民地的民心。要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民心這樣東西，和兵力一樣的重要。不錯，日本軍隊的許多特質，使日本獲得許多極大的勝利，但是正是這些特質，毀滅了日本征服工作的價值；因為軍人統治了一切的緣故，使日本永遠不能安撫被征服的人民。

日本所用的方法是他成功的障礙

日本在華成功最大的障礙，不是軍隊、大砲、飛機或經濟的持久力有了問題，而是她的殖民的方法中含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在台灣，在朝鮮，在滿洲，日本人的統治，顯然並不能使一切穩定起來，反而使一切陷於永久戰爭的狀態之中。西方觀察家，在這總錯的亞洲形勢之中，很少有人能對於這一方面作過仔細的觀察。

中立的軍事專家，見到中國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都認為日本決不能有那麼多的軍隊，足以佔領整個的中國，

並且日本的財政經濟，也決沒有力量去供給其國家所能徵調的極大限度的軍隊。這些軍事專家更覺得，縱然日本把中國所有的城市和交通線都佔領了，縱然中國被這樣地征服了，要想以日本人所知道的所應用的那些方法，去征服中國人民，是絕對辦不到的，中國人民決不被會日本征服，中國人民也決不會和日本和平。

日本要求和平

日本目下很需要和平，她在對英關係中的許多動作，都是向着這個方向進行的。她顯然準備放棄那種佔領和統治整個中國的企圖；並且滿心想要尋覓一個暫時解決辦法，使其能控制中國沿海的省份；而另一方面，仍讓那個和她敵對的「中國的中國」在廣大的內地，繼續存在。但是這種和平，實際上祇不過等於休戰而已。因為未被佔領的那一部份的中國，將努力整軍，準備一次雪仇的戰爭，同時政治的宣傳和密謀，將使佔領區內不斷發生祕密的叛亂。

日本要想獲得勝利，其唯一的希望，是在乎她能否把那些被她軍隊所蹂躪所征服的區域之內的物質和經濟復興起來。假如日本能使這些地方很快的繁榮起來，假如日本能從那些侵佔的區域中獲得利益去供養她的軍隊，她也許能夠再來一次「躍進」。至少她能夠應付那改組以後和重整了軍備的中國的挑戰。但是我們從日本所有的建立帝國之企圖中，看出日本沒有這種適應的能力。

直到今年七月中旬，當戰事進入第三年的時候，日本軍隊差不多已經佔領了中國整個的海岸和中國所有的大城市，然而東京仍不敢說日本已在實際上征服了中國，而全世界人士也都更相信，中國是不可征服的。就說日本發動這次戰事

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但是顯然的，「時間與空間」還是屬於中國；並且日本獲得真正勝利的日子，和在開始這次長期戰事之蘆溝橋畔的槍聲響的時候一樣，仍舊是遙遙無期。

日本希望中國自行潰裂

就軍事意義方面講，日本已經戰勝了；但就一般來說，祇有中國纔能戰敗中國。日今日本真正勝利的希望，不在軍事，而在她能否正確地估計中國的特質和中國人民的特性。不過到現在，日本還在那裏希望中國在政治上的分裂，希望中國妥協，希望中國打消統一抗戰的意志。

將來若有人把這次不宣之戰的軍事戰略史追述出來的話，可以看出，日本用了相當小的兵力，確得到了不少驚人的成就。在兩年戰事之後，日本在中國本部的軍隊（即在長城以南，滿洲並不在內）其人數還不會超出五十萬人。以上海附近的杭州灣一直到外蒙古邊界的綏遠省西北，那條三千一百英里的戰線，都靠這五十萬人來維持。平均每英里祇有一百六十一人；這是說若把這五十萬人都分佈在這條戰線上，每英里纔攤一百六十一人。但實際上，這五十萬人之中，祇有一半是駐守在這條防線上，其餘的一半是用在佔領區內，守衛那些大的城鎮，保護鐵道、公路、運河，並且還要追擊那些不斷地在騷擾他們的游擊隊和土匪。

在滿洲國，日本還集中有軍隊五十萬，那裏有四千英里的防線需要他們守衛。顯然的，日本要想肅清中國本部佔領區以內的游擊隊，而使農工商各業都能恢復，那祇少還要五十萬兵纔行。可是日本能否再行供給這麼大的人力，我們正在懷疑，因為日本國內的勞動力，已經極端感覺缺乏了。婦女正在代替男子，在田裏和礦場裏工作，並且有數千中學生也都變成軍工廠的工人了。

日本還不會得到利益

在大多數佔領區以內，日本人的權力，實際上還達不到他們的機關槍射程以外。這可表示出，日本人的這次賭博，經過兩年以後，還不會開始撈到利益。假如日本在華軍隊，不能趕快在佔領區以內獲得一切來供給他自身的需要，這對於日本經濟的影響將愈趨嚴重。在軍事上，在政治上，在經濟上、中國好似一塊極大的流沙，日本祇要向前進一步，這流沙立刻又在她的背後，翻出身來。所以日本不斷的前進是可能的，可是要後退却想都不必想。日軍愈深入內地，則佔領區內的華人，破壞交通線，襲擊城鎮，毀破軍火食糧庫等工作，也來得愈兇。

沒有殖民的才能

日本在殖民地上的一切情形，表示日本缺乏英、法、荷等國所具有的那種殖民的本能和才幹。日本統治台灣已經有四十多年了，而台灣人並不快樂或滿意。高麗也被她統治有三十多年了，不錯，在物質方面，她把高麗治理得很不壞，譬如，森林已種植起來了，災荒也沒有了，水利也整理了，因為蓄水和灌溉建設的完成，旱災也絕跡了；可是，高麗的人民，對於日本人，却恨之入骨。

滿洲國的情形也是一樣。有許住在滿洲的中國人，因為憎惡張學良的虐政和苛捐雜稅，所以曾歡迎過日本人，把日本人認作他們的救星。日本人把滿洲拿了過去之後，把金融穩定了，把苛捐雜稅也廢除了，把公路和鐵道都修築起來了，把工業也發展了，並且對農民的需要也作種種打算（其實這都是為着日本自身的利益）。可是，目下滿洲的人民都痛恨日本人。這種仇恨，正在一年一年的增長着。〔待續〕

## 馬克斯主義之崩潰 毛一波

十 中國人的對俄問題

我這篇文章，是在專駁晨報副刊上陳啓修之「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一文，特在此先事申明。

陳啓修之爲人，有人說他是「非赤化者流」，然在我看來，他至少是傾向於赤化的（注意：我此地所謂赤化，即指布爾什維克化）。他崇拜蘇俄，他誤認蘇俄是共產主張的國家，他更誤認蘇俄是反帝國主義者流。所以他說『蘇聯事實上已經成爲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中心，不但他的潛勢力已竄入一切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中間，而且蔓延於各大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中間了』（注意！俄國共產黨去年成立，日本新成的無產階級政黨也是屬於第三國際的）；其實蘇俄何嘗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他不過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者而已。蘇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雖爆發了偉大的社會革命，然而這種革命並未由列寧黨去完全，因爲列寧黨實行了他們的謬誤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破壞了蘇俄的經濟組織；這樣的結果，於是逼着列寧黨去恢復了沙皇時代的資本主義。一國的經濟組織，常是要決定他政治的實施，所以現在的蘇俄，仍不免有帝國主義的臭味。現在列寧黨雖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然而只是一種外交手段；實際上，一九一八年勃萊斯脫和約、列寧黨便和德國帝國主義者妥協，犧牲了立陶宛、芬蘭、烏克蘭及白俄居民的幸福。一九二五年的日俄協約，列寧黨又居然允許日本之壓迫韓國民族的獨立。由此，可知陳君的甚麼蘇俄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中心』，簡直是不合事實之談了。至於蘇俄在各國無產階級中間的潛勢力，雖然不能說全無，然而力量確是很小；因爲蘇俄本身只是列寧黨

## 英美企圖封鎖日本的一幕

Drew Pearson  
Robert S. Allen 作  
木 軍 譯

對於美國的遠東政策，欲獲得充份的瞭解，我們必須回溯到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即日軍進攻上海的時候。那時美國國務卿赫爾曾與英國舉行數次極端重要的祕密談話。

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英國方面，恐怕日本征服中國後，獲得了各種原料而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要把英國的織維工業和美國棉業一起掃蕩了。

赫爾對於此點，亦抱同樣的見解。彼更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愈來愈胡鬧了，也必需給他們一個教訓。但是他覺得美國不能和英國在歐洲合作達到那種足以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個教訓的程度。然美國在遠東，却擁有更大的利益，或許能和英國合作去教訓教訓那遠東的獨裁國。

于是英美海軍專家便討論長距離封鎖日本的計劃，這種封鎖，若用來對付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國，都是不可能的，然對付日本則可，蓋因日本爲一串島嶼，且大半原料均仰給外國輸入之故也。

只須駐在新加坡和巴拿馬的軍艦，再加上蘇聯的合作，三個月之內，就可使日本發生飢荒。

但那時美國却躊躇不定，並不實行調派軍艦，經蘇聯途河開往新加坡，說是恐怕歐洲行將發生突然的變故。一直到最後，她纔同意派遣戰艦四艘、巡洋艦十二艘、驅逐艦二十艘。不料這個消息被墨索里尼聽到，那時意國已

專政的國家，即俄國的無產階級，仍然在受着壓迫；所以蘇俄雖靠國外的宣傳，愚弄那各國的無產階級，然而這種愚弄政策的黑幕已漸漸地被人揭穿了；因為現在列國的工人，已明白了列寧黨之目的不在無產階級解放，而在掠取政權。故列寧黨現時在世界的勢力大為減退。我試將一九二四年蘇俄各雜誌所載的一個統計表錄下：

國籍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四年
德意志	三六〇、〇〇〇	二六六、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法蘭西	一三〇、〇〇〇	七八、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意大利	七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新羅巴卡	三六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
美吉利	一〇、〇〇〇	五、一一五	三、〇〇〇
瑞典	九七、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荷蘭	一五、〇〇〇	一二、一四三	一二、〇〇〇
丹麥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七〇〇
西班牙	四、〇〇〇	二、五〇〇	一、七〇〇
瑞	六、〇〇〇	五、二〇〇	四、〇〇〇
波蘭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比利時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俄羅斯	七〇四、〇〇〇	四〇八、一四二	二四〇、九九〇
	五九	五一七	五九

現在英國的共產黨雖於去年正式成立，然而一個妥協的政黨，實際並不能得無產階級的同情。日本新成的無產政黨，更是一種不革命的團體，他的前身是費比恩協會（資產階級的學術團體），勞動總同盟（黃色組合），農民組合（去年組成的妥協團體）及商工黨（勞資合作的團體）；現在既同屬於第三國際，不過表明他是一羣妥協主義者的新結合罷了，這也值得陳君的調笑麼？

陳君是主張聯合蘇俄的人，他從國際形勢上去解說道：『現在國際政治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和反帝主義對壘的形勢，蘇聯是反帝國主義方面的中心……所以主張聯俄』・於此，我

與東京柏林發生密切關係！于是他便在地中海上，開始他的潛艇的海盜行動了。

這樣一來，英國很擔心她的商運，于是把預定開往新加坡的軍艦又下令停駛了。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和九月上旬的事。」

英美這幾次會商的主要的推動者是赫爾，他比羅斯福還更着急，想給日本一個教訓。而羅斯福對於美國輿情是否讚同此舉，尚無把握，於是便發表了著名的芝加哥演說，藉以測驗輿情。在這次演講中，羅斯福知道了：美國參加制裁日本的行動，其可能性是沒有的。

於是赫爾的那一團輿論也就稍微減退了一些。赫爾的國際政策，曾向他的一位顧問表示過，下面是這位顧問筆錄赫爾的談話：

赫爾說：『總統和我都認為，世界上的獨裁國，都正在實行一種政策，這種政策終久會引起我們的麻煩。』

『我正在慢慢設法，使得我們的人民，明白我們在歐洲和亞洲所遭遇的一切。我會不斷地發表報界所認為忠誠的告誡。我現在正在徐緩而審慎的進行一切。我們不能去恐嚇我們的人民，我們要去教育他們。』

『我正在設法使人民知道，完全的孤立是辦不到的。芝加哥也會講過這些，不過有時似嫌過火了一些。芝加哥演講有點突如其来，人民還沒到能夠受他的演辭的時候，他把人民嚇住了。但終久我們可以證明，我們是不能孤立的。』

芝加哥演說以後赫爾之退却，是白魯賽會議瓦解原因之一。這次白魯賽會議，乃英美擬對日本實行封鎖之第二次企圖也。

可以告訴陳君：在任何國的資本主義未消滅以前，所謂反帝國主義，不是以某一國政府為中心的對壘，而是一種國際間無產階級之聯合的階級鬥爭。因為現在世界上的國家（蘇俄也在內）統統是資本主義的組織，而所謂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階段；要反帝國主義，必須先要消滅資本主義。現在的蘇俄，居然容認資本主義之發展，居然步着帝國主義的進程；自然在他根本上不配（實際上也不能）來反帝國主義（注意！帝國主義一詞的使用，他的對象是弱小民族，我此地之所以只說無產階級者，以實際上，只有無產階級纔是反帝國主義的中心）。

現在的中國，不諱言是受着各種形式（所謂赤色白色）的帝國主義之侵掠，自然應該起來做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但是這種運動，絕對不能靠蘇俄政府，我們須團結中國的無產階級，我們須聯絡各國的無產階級去從事（一切忌聯合各國政府，蘇俄當然在內）。因為要這樣纔能打倒帝國主義，纔能使中國人到自由之路。

陳君又從中俄的經濟關係上說，必須聯俄。他並且說：「俄國是曾經放棄特權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所以不怕他用不平等的通商條約只行利於他而不利於我的通商行為」；其實這話也靠不大住。中俄協定上雖規定有「兩締約國關稅則，採取平等相互主義，同時協定」云云，但此種條約，乃是按照彼此相待最優之國辦理之意，而與中國人並無好處。因蘇俄之通商條例，限制極嚴，雖許私人營商，然捐稅特重，而中國與俄彼此按照相待最優國之辦理時，則結果只有中國優待俄，並不能要求蘇俄優待華人，如前清之各國商約然。所以若說與蘇俄修好通商，有很好處，簡直是一種妄想。

因了上面的原故，我是反對陳啟修君之主張聯絡蘇俄政府，我以為聯絡蘇俄的無產階級可也。而聯絡蘇俄政府則大可不必。中國青年們，你們對此的思想如何？（一九二七）

這一次英國不像以前那樣猶豫了。一九三七年夏天，赫爾向前進，英國却向後退，這次恰好相反。英外相艾登，的確把英國軍艦行將駐紮的地區及封鎖日本的計劃，都告知美國駐白魯賽大使台維斯（Norman Davis）了。

但赫爾說：「不行。」

從此以後，赫爾固然不再談論封鎖這回事了。但是在日本飛機轟炸瀋陽號軍艦的時候，他又猶豫起來了。那時美國海軍上將萊西曾向羅斯福報告說：

「十天之內我能全部出動，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一切過去的戰爭，再沒有比這次簡單。我們駐幾艘軍艦在新加坡，再駐幾艘在巴拿馬。英國已通知我們，答應派遣軍艦十六艘（我們本向她要二十四艘，其實我們並不需要那樣多）。蘇聯在海參威有潛艇五十艘，可以派往騷擾長崎至上海的交通線。」

「我敢擔保我們不會損失兩艘以上的軍艦。」

但是霍爾却躊躇的說：「我們最好到另一件事變發生時再說罷。」

但是次年，美國另有一艘砲艦瓢虫號，停泊在揚子江中，赫爾又擔心了，恐怕發生第二次瀋陽事件，所以他叫萊西上將將該艦調往他處。

現在，赫爾可不必擔心遠東的危機了，因為日本決不會再來和美國惹事。現在一個美國人，要在天津打幾下日本哨兵的耳光都不要緊，並且不會受到懲罰。日本人在遠東對美國簡直客氣得無以復加了。可是等到她把英國趕出了遠東之後，那時就輪到美國頭上來了。

（這是一幕歷史劇，原文載 Washington Syndicated Service。我們中國人不想自力更生，要等待英美共同制裁日本嗎？歐洲又在遍地烽火，英國更自顧不暇了。美國呢？不知到了什麼時候，他才「教育」好他的人民；更不知到了什麼時候，他才好等着「另一件大事變」發生！」——譯者）

## 與中美日報略談和平

余文周

—46—

繼着譯報的下巴而起的「中美日報」，在受了租界當局的一度停刊處分之後，似乎已把過去的瘋狂態度收斂了一些。它的瘋狂，是一直在抗戰獨幕劇的單調圈中打轉的；自從抗戰舞台的重慶政府接二連三的發出求和的波動之後，它的瘋狂姿態也就變了不少形質。

中美日報也談起和平來了。

上月二十二日該報社論——一篇討論和平的大文——，第一句便揭示著：「近日中日和平空氣又甚囂塵上」，不啻公然承認了重慶的和平「謠傳」。但是他却又避去重慶於不談，只對着日本說話。他說：「爲日本打算，當然最好趁中國尚未決戰，美國尚未下手的時候，結束戰事，否則不免要不得下場，大大的丟臉了」。話說得何等慷慨偉大！他以為如此便可以把日本嚇退。可惜他並未把中國何時「決戰」和美國如何「下手」加以詳述，文章的威力尚嫌不足，殊深遺憾耳！

在恫嚇之後，接着說：「日本要結

束戰事，必須：（一）無條件的撤退侵華軍隊，（二）接受九國公約及有關遠東各條約的約束。換言之，日本必須向中國和國際自認錯誤」。這大概就是中美日報的和平辦法了。這個辦法誠能辦到，則不僅是和平，而且是中國的大勝特勝了，那還有誰會說不顧！可是真個辦得到嗎？好在不用我說，他自己亦已承認：「這一層，恐日本在今日，未必有如此的決心與勇氣」。可是爲什麼日本未必有如此的決心與勇氣呢？他又是避而不言。

現在我們假定中美日報筆者的兩個辦法是辦法，試稍商討：第一點，要日本軍隊無條件的撤退。不知這是據何理由？普通在戰爭發生後，軍隊的撤退不外兩端：一種是戰敗的撤退，一種是休戰條約簽訂之後的撤退；日本現在既非戰敗，當然沒有無條件撤退之理。這並不是我們有意爲虎作倀，乃是一種常識：古今中外，絕無軍事勝利的國家無條件撤退駐軍之例。我們認爲日本撤兵不

難，難在不與日本談判。中美日報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事，偏要拿來遊談，豈僅不誠，亦屬不智。我覺得中美日報以後大可不必再提和平二字，索性跟着共產黨喊長期抗戰吧。

第二點，要日本遵守九國公約。九國公約爲何物，姑不置論；但是九國公約之需要修改，不僅日本有此提議，即在美國也早於去年年終時聲明可以考慮了；難道以美國爲是的中美日報記者竟還不知？我們深深知道，這位筆者之所以拿九國公約來作說詞，目的還是在希冀國際調停。但是我們不得不揭穿來正告中美日報：重慶的國際調停之夢，已弄得走頭無路了呀！

所謂國際調停，簡單說，就是請第三國來做中人。在商業上，做中人是要拿中佣的；在國際交涉上，做中人是更有中佣可拿。就爲了有中佣可拿，每個第三國都想來做一個中人；於是中日和議未成，她們倒先搶奪起來了。大概中美日報記者總還記得，當中日戰事初起

的時候，美國首先聲明：「將來解決遠東問題時，美國必須居於極重要之地位」。這個聲明是對英國而發的，目的在警告英國不得單獨調停中日爭端。前此的英日東京談判，本來就是英國調停中日問題前奏曲，可是給美國的廢止美日商約一棒打散了。拿最近情形來說：誠如王寵惠先生所言，現時在遠東關係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是美國，美國若正面調停，中國不必說，日本亦未必不相當接受；英國與蘇聯看到這點，誠恐美國調停一旦實現，自己得不着「中用」的好處，因此莫斯科也醞釀中日和平問題了，英國是更着急，又派寇爾大使到重慶秘密活動了。試問，這樣的國際調停能實現嗎？即能實現，它的實質又是什麼呀？

次就重慶的實際狀況而言：除了共產派的孫科邵力子之流不算，又除了李白馮等人民陣線派不算，此外還有三派：一是歐美派，如王寵惠孔祥熙宋子文王正廷宋美齡等；二是知日派，如張羣何應欽何成濬居正張公權許世英等；三是元老派，如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等。

這三派中，歐美派是極端主張國際調停的，而且主張由美國領導英國來調停；他們的活動，言論上有孔祥熙和王寵惠的和平談話，行動上有宋子文與王正廷的奔走，可是終無眉目。知日派方面，主張如國際調停不易實現，不妨直接交涉，尤以何應欽與張羣主張最力。元老派呢，他們是國際調停也好，直接交涉也好，只要能和平；他們對於共產黨的長期抗戰與焦土政策之類，是極端痛恨的；李石曾來往於港渝之間，活動不謂不力。

事實百分之百的明顯：國內情形既複雜如此，國際狀況又險惡如彼；毫無主張的重慶當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結果之一事無成，亦何待說。試看最近一月間，重慶當局為求國際調停所翻的花樣，不知若干了，結果是一種花樣也沒有出路；因為在國際調上沒有出路，便又退而求其次，表示願意對日直接交涉，而且願意先停戰後撤兵；可是結果又為蔣氏下野問題，接治中斷。東路走不通，西路又告斷絕，重慶的和平是沒有希望了呀！好吧，和平沒有希望，再來抗戰吧！

所以重慶在最近又否認一切和平活動，說是中國惟有抗戰到底了。而且，為謀抗戰到底的基礎鞏固起來，不得不在後方佈置退路：一是來一個鵲巢鳩占，把四川主席王鑛緒趕開；二是準備利用紅軍排除雲南主席龍雲；這兩件事辦妥，至少可以像漢劉備之割據西川一樣，維持幾時。

還有第三個佈置，就是聯俄。中蘇軍事同盟與蘇俄紅軍開入新疆等地二事，雖經重慶否認，可是歐美各國所得的情報却是鑿鑿有據的。此一佈置當然更為必要，因為川滇一角終非久居之地，萬一川滇不保，則退至由蘇俄新扶植起來的新疆，仍有登台說法之餘地；再不然，還可以索性投到莫斯科去哩。

我們檢討重慶政府由抗戰而和平，又由和平而抗戰的一串動作，除了直率的為之歎息之外，不願再添什麼感想。現在中美日報在上海，可算是重慶老板遠留滬濱的一支「孤軍」；我看這支「孤軍」的中美日報還是老老實實地跟着老板的步趨走吧！現在老板又抗戰了，「孤軍」也要跟着抗戰才是，何故亂了步驟妄談和平？

## 予欲無言集 葉紀懷

四四 中國究竟爲誰而戰？

美國參議院於上月十六日開會時，有一位參議員說：『以遠大之目光觀察，中國今日實爲美國而戰』。消息傳來，重慶當局及上海各報如中美申報華美報等，相繼爲文頌揚之。記得上半年某時期，英外相哈里法克斯也曾說過『中國是爲英國而戰』，也曾爲重慶當局及各報所讚揚。

『中國究竟是爲誰而戰呢？』

有人說：『中國以前是爲英國而戰，現在則是爲美國而戰』；照此說來，中國以後也許還要爲蘇俄而戰，爲法國而戰，爲坎拿大菲列賓而戰。這真是中國的威風！別的國家不能抵抗強暴而中國能一一「爲」之捨身赴難；這種精神，豈不威風凜凜？

在上海，有一種專門替人家打相打的白相人，叫做「打手」。張三有錢可以使他打李四，李四有錢也可以使他打張三。只要有錢，他可以「爲」任何人去打人。如果把中國之抗日本，比之爲「爲英國」「爲美國」而戰的白相人的「打手」，豈不侮蔑了中國的國格！

可是我們覺得英美兩國人士所說的「中國爲英美而戰」一句話，除了「侮蔑」之外，實在別無其他感想。

四五 美國的援助

在歐戰中，美國不是說援助英法一方面的嗎？

上月二十五日華盛頓路透社電：『據國務院之宣佈：自

九月五日援用中立法以來，對交戰國輸出軍火憑照被撤回者

共值美金七千五百萬元以上；其中爲法國採辦者值五千七百五十萬元，英國值一千五百萬元，澳洲五百萬元，德國則僅「五」萬元』云云。若照此一事件來計算，德國受的損失爲一分，英法方面爲其一百五十倍。

當然，援助之道原不止軍火一端；可是在戰與正濃的今日，如此一來，不說作戰的實質上，即就作戰精神而言，英法的打擊也就不算小吧？

有些人說：『這件事與中國無關，中國是絲毫損失沒有』。假使一切問題都是很單純的，那末我們對於這種說話也就無庸回答了。

四六 關於中蘇軍事協定

中蘇締結軍事協定一事，好像是一個謎。上月中旬，國內外紛紛傳說之時，重慶當局對之默無表示；據十六日重慶路透電稱：『有以中蘇不日將訂軍事協定消息叩諸當局者，彼等皆不欲對此問題加以批評；據觀察家聲稱：中蘇軍事協定之說，傳之已久；兩年前即宣傳之；後此曾時作時報』云云；按之語意，再加旁證蘇聯在中國西北的軍事動作，足徵此一消息，必非毫無影蹤的虛偽宣傳。尤其是美國官場對此亦「拒不批評」（二十日華盛頓美聯社電），個中意味，更爲深長。但是隔了幾天，重慶方面又一口否認了。仔細一研究，原來美國官場的「拒不批評」，正是重慶的「一口否認」的主要原因！

承認也能，否認也能；只令人不解者：重慶當局既然不斷宣言中蘇關係如何如何密切，爲什麼對於中蘇締結軍事協定一事又諱莫深如呢？

可知重慶當局的說話，折扣很大。